

## 浅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

2006-5-30 李蜀人 阅读620次

自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它就同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直产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并逐步取代了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成为了合法的国家意识形态。

然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出现了危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的总体评价,大多数人认为是脱离了现实、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生活。其主要表现是在社会现实生活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失语的,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为此,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两种走向: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叛,企图用另外的哲学来取代之;另一种是提出了“重新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呼声,认为这种危机主要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失误,误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呼声现在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学术研究又成为了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热潮。然而,造成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呢,抑或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出了问题?这一问题又是我们必须澄清的。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危机并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出现了失误。在具体的检讨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有的认为是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致使我们自己的研究没有能适应社会的变化,等等。这些解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可以构成这种危机的原因解释之一。但是,就学术或思想研究而言,这些解释却又都是片面的,还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因为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都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为什么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这样的影响格外突出呢?在这样的质疑基础上,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切换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的思考上来,重新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名称之下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因为从世界哲学史上说,将一种哲学思想同社会现实生活结合得如此紧密,无论在哲学史还是在社会发展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我们认为,也许在哲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观念上的失误是造成这种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

—

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中,人们的基本的认识是,哲学同社会发展肯定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在如何相关上,则有很大的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般认为,由于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因此,哲学就应该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这种指导,一方面是建构性的,即为社会提供思想支持;另一方面,哲学又是批判性的,即为社会发展提供方向。同样的,社会发展,又为哲学发展提供了动力。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是,当社会发生变化时,哲学却没有能随之发生变化,哲学与社会发展出现了脱节,那么,这就意味着哲学出现了危机。按照这种认识,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出现的危机,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未能适应这种变化。问题是如何变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适应社会的变化呢?回到“马克思”,从文本出发来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界定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适应现在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固然是一种发展,然而,当中国社会在未来又发展到一种新的阶段时,我们是不是又需要回到“马克思”,再创立出另外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种认识好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我们希望她成为什么样,她就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认为,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涉及到更为根本的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即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称为哲学?其实,这一问题的实质直

接涉及到了哲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涉及到了我们如何理解哲学的本性这一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这涉及到了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我们是从哲学本身来理解呢还是将其理解为现实的政治性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所出现的这种危机,在本质上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观念上的一种觉醒。它企图摆脱那种长期以来将哲学看作为政治工具的功利主义的肤浅哲学理念,希望从哲学本身的意义上重新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果要从哲学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的本性。从哲学发展的历史上说,哲学一经产生就是追求智慧之学,而不是所谓的智慧本身。因此,一方面,哲学是对于智慧的追求,哲学在本性上就体现出它的反思性、批判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哲学的智慧体现在它是始终关注人和社会的终极问题的独特学科。因而,一旦人们将哲学当作是智慧本身,将其当作社会现实生活的工具,从而使其彻底丧失了反思性、批判性和创新性,那么,也就丧失了哲学的本性;一旦人们要求哲学去解决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而不是终极的问题,那么,哲学就只能沦为社会的装饰或门面。

海德格尔在他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在他看来,哲学就是探询“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这一首要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活动。因为这一问题在地位上具有最广泛性、最深刻性和最原始性。这种首要的问题并不是时间序列上的首要。因为在时间性的历史进程中,个人和民族要询问的东西有很多。在遇到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有很多问题得到了探究和考察。但是,真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探究。因为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会遇上这个问题。他们还没有进入这一问题的发问状态中,使这一问题得以成立,得以提出。因此,他说道:“哪里出现了这样的活动,那里就有哲学。”在这种意义上说,哲学就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也不是大多数人的日常活动。所以,哲学并不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思想活动,相反,哲学在根本上就是不合时宜的。对此,海德格尔说:“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的当下现今,或者反过头来把这一现今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存在联结起来,哲学活动始终是这样一种知:这种知非但不能给弄得合乎时宜,倒要把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这就是说,哲学既超越时代,又规定时代的标准。因此,如果是哲学在当下现今找到直接反响,也就是说,如果哲学成为了一种时尚,那么,或者它不是真正的哲学,或者哲学被误解了,被按照与哲学无关的某种目的误用于日常需要。所以,海德格尔指出:“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也就不是一种人们可以像对待工艺性和技术性的知识那样直接学到的知识;不是那种人们可以象对待科学的和职业性的知识那样直接运用并可以指望其实用性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某种完全无用的知识。然而,“这种无用的东西,却恰恰拥有真正的威力。这种不承认日常生活中直接反响(Widerklang)的东西,却能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生发最内在的共振谐响(Einklang)。它甚至可能是这种共振谐响的先声(Vorklang)。”这样,哲学就不得不同民族历史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是这种命运的先知。

但是,在现实社会里,由于人们对于哲学这种本性的无知,由于人们对于哲学的日常期盼,一直流行着关于哲学的种种误解。虽然这些误解关于哲学多少说中了几分,但是,它们都是短见,都未能切中哲学的根本性质。海德格尔认为,比较典型的是两种:其一是人们对于哲学的本质要求过多;其二是曲解了哲学所起作用的意义。这两种误解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主流观念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由于哲学是通过强调人类自身在其中所获得的意义和目标设置,从而将目标指向存在者的最初的和最后的根据,因此,它就很容易给人们这样一种假象,仿佛哲学就是必须为当下现今以及将来的历史的此在、为一个民族创造出时代文化奠基于上的基础来。然而,对于哲学的能力做这样的期望和要求未免过于奢求。因为哲学从来就不可能具有直接性的力量,不可能造成生发一种历史状态的方法和机会。哲学的影响只有通过某种间接的方式和不可能预知的迂回道路发挥出来。然而,大多数的人看不到哲学的这种性质,反倒要求哲学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而且这种奢求的情况大多是对哲学的指责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们常说应该拒斥形而上学、拒斥哲学,因为它们无助于社会现实。这就好像因为木工刨床不能栽人上天,就应该将其抛弃一样滑稽可笑。因此,海德格尔说道:“哲学按其本质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一种从思的角度来对赋予尺度和品位的知之渠道和视野的开放。一个民族就是在这种知并从此种知中体会出它在历史的精神世界中的此在并完成其此在。正是这种知,激发着而且迫使着而且追求着一切追问和评价。”这就是说,哲学应该从思想观念上来批判或检查社会现实的标准和尺度,创造出新的标准和尺度,并帮助人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完成这些标准和尺度,而不是仅仅为社会现实的标准和尺度提供

理论依据。然而,人们仍然认为,即使哲学不可能为一种文化创造出基础,但是,哲学起码还可以为文化建设创造便利,提供一幅关于各种各样可能事物以及事物领域的世界图景,并由此指明普遍的规律性方向或者通过它思考科学的前提。就是说,哲学可以简化科学事业,可以被期望用来促进和加速实践性—技术性的文化进程。这是第二种对哲学的典型误解。就其本质而言,哲学决不会使事情变得简化和浅易,而只会使之愈加艰深。因为日常理性并不熟悉哲学的表述方式,并不知道哲学的真正功用就在于加重历史性此在以及从根本上说是加重绝对的存在,也不知道沉重艰深是一切伟大事物出现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人类正是首先根据这些伟大事物来考虑一个历史上的民族以及它的成就和命运。哲学正是开放着这样的真知的途径和视界。

这些误解又为现在的研究和教育所加剧,哲学已经成为了知识,成为了分门别类的一门“学科”。所以,人们或者相信哲学是无用的,或者期望哲学应该是有用的。总之,人们按照日常生活的标准来评判哲学,就像按照这种日常标准来评价自行车的效用和评价蒸汽浴的效用一样。然而,哲学从本性上说并不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活动。它总是超越了日常事物,它所追问的不是日常熟悉的和处于日常秩序中的正常事物。甚至是它的提问方式也是超乎寻常的。这就是说,哲学的发问不是就在路边,不是人们在某天可以毫不经心、甚至意外地碰上的。这种发问也不会因满足生计需要而提出。哲学的发问与日常生活无关。哲学完全是自由自在的,完全并真正地立足于自由的此在基础之上,立足于人们称之为根源的基础之上而生成人类特有的活动。因此,哲学就只能同社会现实的终极的、根本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社会现实的一般问题相关。因而一旦哲学能够对社会现实的一般问题做出回答,它便丧失了哲学的本性而成为了“知识”或者是某种“学科”。

## 二

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情况就是如此。从根本上说,它不能回答当今社会的终极问题,甚至它提问的方式也还没有奠基在哲学的基础上,而仅仅是从社会现实的日常生活基础上开始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中国社会救亡和富强的政治工具,或者是一种学科和理论。在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段时间内,作为政治性理论,它也确实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从而构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然而,当要求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回答当今中国社会的终极问题时,人们对于哲学的误解就暴露无遗,这种哲学就处在了失语的、边缘化或自我放逐的状态之中。

根据西方学者伯纳尔的考证,在中国社会里,“一九〇七年以前简直没有什么人提及马克思。”他认为,在十月革命之前,整个中国只有少数的留学生知道并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一点学术思想,但对中国知识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影响是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因此,毛泽东在其所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道:“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判断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过程。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一起,被中国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欢迎、所接受、所传播、所信仰”,这种独特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革命性实践品质。因此,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的思想武器而被引进到中国来的。所以,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于中国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就成为了在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李大钊1919年5月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即《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做了经典概括。他说道:“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那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唯物史观,因为“离了他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而将这三部分理论联系起来的,就是阶级斗争学说。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也是将阶级斗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以此来反对他先前所信仰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因为在陈独秀看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劳动人民,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能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因为这样一来,资产阶级便有可能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这样,从此以后,阶级斗争理论便成为了“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最基本的理论学说和基本观念。”以至毛泽东概括地说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当然，阶级斗争并不是唯物史观的全部，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选择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没有选择其他部分，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社会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因素，提供的仅仅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是对将来的期盼，而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表述，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它才可能构成中国社会生活根本改变的法则，才可能完成中国的强国富民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无论是陈独秀1923年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还是毛泽东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都主要是从当时整个阶级的情况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其目的是要表明，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伦理的社会，而是同西方社会一样，是一种阶级社会。而阶级社会就是有压迫有剥削的社会，因此，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社会。这就为举行革命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然而，随着瞿秋白、毛泽东、李达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仅仅是历史观而成为了宇宙论，成为了人们的世界观。这就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品质。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使其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性理论。在1949年建国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必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就成为了重要的政治任务。艾思奇先生在1959年出版了《唯物主义纲要》，1961年，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艾思奇先生任哲学专业组长，主持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体系”。该体系除“绪论”外，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这一体系基本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比较系统而准确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对于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它完成了从间接接受到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变，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中国人的主流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由于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对未来的设想而没有具体的论述，由于当时中国受到苏俄的严重影响，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使得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等人，更关心的是国家的性质而不是国家的状况，因而，他们更多地仍然还是坚持了阶级斗争理论，更加关注政治而不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说道：“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他认为，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有政治斗争，体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所以，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他认为，不仅是农业，而且意识形态等领域都存在着阶级斗争。他说道：“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理论依据，以“政治挂帅”为行动纲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了那一段历史时期的基本哲学思想。

因此，在毛泽东逝世后的1976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学术命题的讨论，很快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然而，它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理论成果。因为这一讨论并没有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是更多的还是一种政治运动。真正在哲学理论上所有突破有所创新的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因此，对于“异化”的讨论，对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盛极一时。甚至有很多人直接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

但是，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却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意。对此，李泽厚先生说道：“因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它既有科学的内容，也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用人道主义来解说马克思主义就会将马克思主义退回到启蒙运动的理论上去，使得马克思主义过于空泛和抽象，而这又正是马克思本人极力反对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又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应该是马克思独特的贡献，因而对于实践的研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最大的热点。这种研究固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正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西方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但是，它并没有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有别于其他西方哲学的革命性、科学性和批判性。也就是说，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为此，“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又成为了今天的时髦。这些学者试图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重新建立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来为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服务。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带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反倒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危机，它的合法性受到了严厉的质疑。其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当今社会生活面前的失语。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到冷淡，甚至厌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或学术思想而被中国人接受的,从一开始它就同中国的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它不能不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常常是在学术的名誉下表达的政治要求和主张。在一段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的还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体现出了它的一些特征。然而,到了建国以后,在建构一种新社会的过程中,这种批判性和创新性逐渐丧失。所以,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了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在如何重建上至今争论很大。

我们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真正将其看作为一种哲学。这就要求我们从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上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能将其看作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理论,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是最根本的;其次是在哲学同社会的关系上,不要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迫它超出哲学的范围去应对现实问题,因为它真正关注的并不是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題,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问题,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业。只有从这样的历史视野来研究它,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它的伟大作用;再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淡化,我们不能仅仅人为地去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而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哲学思想来研究。为此,建议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多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性和学术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大的历史境域和背景下来透视,努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地张扬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一切的根本所在就是彻底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而不是去粉饰现实。这样才能重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奠定基础,从而真正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

李蜀人,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哲学博士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第4期

网站编辑: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